

文明的搖籃

時代 - 生活叢書

中文版

編輯：徐東濱

副編輯：蕭輝楷 蕭定韓

助理編輯：張柱

編輯助理：嚴慧

本書譯者：時代公司 楊宗翰

出版者：時代公司

Authoriz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1979 Time Inc.

Original U.S.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1967 Time-Life Boo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人類的偉大時代
世界各主要文化的歷史

文明的搖籃

塞繆爾·諾亞·克萊默
與
時代 - 生活叢書編輯合著

紐約 時代公司出版

作者

塞繆爾·諾亞·克萊默(Samuel Noah Kramer)是研究兩河流域文明與楔形文字的世界權威之一，1929年取得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學位，嗣更於1930—1931年間多次參與中東考古之行，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出任克拉克基金亞述學研究教授並兼大學博物館牌版部主持人，迄1968年退休為止，著有《蘇邁初民史》《蘇邁風格及其歷史文化》暨《聖經與蘇邁文學之契應》等書。

編輯顧問

倫納德·克里格(Leonard Krieger)，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歷史教授。他的著作有《日耳曼自由觀念》和《相機行事的政治》，並與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費利克斯·吉爾伯特(Felix Gilbert)合著《歷史》。

中文版編輯顧問

余英時，1930年生，香港新亞書院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1962年至1966年任密西根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1966年至1969年任哈佛大學中國史副教授，1969年任該校教授。1973年至197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由1977年開始擔任耶魯大學西摩爾講座歷史教授。他的專業是中國思想史、社會史，英文專著有《漢代之生死觀》、《漢代中外經濟交通》等，中文專著有《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歷史與思想》、《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等。

封面說明

5000年前的石膏小像，是無暇禱求的善信放置神壇之前為己代禱的替身，像上的大眼表示禱者在頂禮膜拜時，對於蘇邁神明之誠惶誠恐。

目錄

原序	6
1 兩河流域	10
圖與文：從大地中掘出遠古	17
2 人類最初的城市	30
圖與文：蘇邁這個遠古民族	41
3 帝國之演進	50
圖與文：一位君王的豐功偉績	63
4 熙熙攘攘的人民	79
圖與文：無古無今的沼澤地帶生活	87
5 信仰、神話與儀典	99
圖與文：天神和英雄們的一些故事	109
6 知書識字的人	119
圖與文：文字是怎樣開始的	129
7 美好的與實用的	139
圖與文：一座城市的壯麗光輝	147
8 兩河流域的光芒	157
圖與文：文明社會的幾個支柱	163
附錄	173
大事年表	174
誌謝	178
參考書目	178
索引	180

原序

本書所述的，乃是關於遠古諸城所藏之曠世瑰寶的故事。

那些寶物確是真實的金銀財寶，當你目光掠過各插圖時便能了解，它們正是金、銀、精工雕刻的象牙，以及用瑪瑙（亦即紅石髓）、蛇紋石、青金石琢製而成的珍飾之類。然而這些其實最不重要；這些寶物之驚人的、無可估量的價值，遠遠超過那些珍貴材料本身——它們的價值在於對它們的發現所能給予我們的獨特知識：從那些古代地址所發掘出的每一殘片之中，若干已經失去的人類歷史就得以局部重現，從而能夠告訴我們有關文明的種種開始，告訴我們最早建築的城市，在那些城內居住的最初的有文化的人，以及他們面對這一待克服的全新世界時의思想和行徑。

業有寶物出土的那些幽邃的古代城市，即是蘇邁、巴比倫及亞述諸國所屬諸邑。凡此城邑，都已盡在古為兩河流域、今為伊拉克的浩浩平沙之中，頽廢成一個個的灰土墩了；耶利米對它們的預言（聖經舊約耶利米51：43）真正應驗了：“那些城市成為殘地，燥土，荒野，無人居住之地，亦無任何人的子孫經過。”這片土地之內居然有物埋藏，大概是任何人都會視為奇事的。

然而却有人正作此想。富於想像力的尋幽訪古者，在前一世紀中葉便已開始去勘查那些殘址

頽墩，不久即發現了埋在上內的諸宮殿和神廟。在南部的古代蘇邁地域，發掘者找到了古蒂雅王的多座造像以及其他令人驚奇的蘇邁藝術作品。在北部的古亞述諸城，也尋得了雲石刻成的奇偉的人首牡牛，以及描狀亞述歷代諸王戰功的大量浮雕。阿蘇班尼帕王那座馳名圖書館所藏的刻於黏土板上的文獻，則在尼尼微發現，全世界因而得以既驚且喜地讀到了基督教聖經內所提的那些載籍久佚的戰爭，以及瑰偉的吉爾格麥熙史詩所歌詠的對於永恆生命的勇壯追求，和極似基督教聖經所云的洪水故事。

早期的考古發掘，往往只是爲了尋求奇珍異寶來裝飾各博物館，因而每易流於散漫無章，欠缺觀察。直到本世紀初，才開始建立規律，講求方法，並對各種建築遺跡小心注意。待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細心依照地層學概念去仔細從事觀察的這一極端重要的原則，始爲發掘者所了解。在那些年內，不僅獲得了烏爾帝王陵寢中的偉大發現，而且大家還對以往忽略了的許多細微現象也重加注意，使我們對於古代兩河流域的知識得以大爲擴充，在那片亙古茫昧中再朝上推溯了好幾千年，窺見了素未夢想到的各種文化。

這種對於有系統考察的嶄新強調，以及由此而生之果，使考古學的興趣中心也隨之轉移了。

早期考古學家的主要樂趣，在能對基督教聖經獲得新鮮的說明，今日考古發掘之業經公認的新增重要意義則是：考古發掘要能說明歷史的肇端。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地球上任何地方都絕無文化存在。那時以後才開始有了文化；最初的文化拓展地區是兩河流域，其後則是埃及。

這一新的興趣中心——把兩河流域視爲文化搖籃，視爲人類對更豐富生活之最初體驗場所的這種看法——即是本書全部闡述的綱領。初期人類的成就，便是在這一地區踵接聯駢而至的：文字的創製；在納蘭穆辛勝利紀功碑等等上面表現出的那種完美的藝術成就，在哈謨臘比法典中所昭示的那種已達某一程度的法律發展；早期的數學、天文學、語言學等等成就；以及可能算是最偉大的，出自詩人作家之錦心綉口的世界最早的文學——蘇邁人的那一豐富多采、深刻動人的文學。

本書作者克萊默博士，對上述這些事項正是一位無出其右的深入淺出的嚮導。他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蘇邁學家，在對蘇邁文獻的發掘與解釋上都是居功至偉的學者，同時，他更是一位最能坦誠欽佩上古文明、最肯替上古文明挺身辯護的學術勇士——這一鴻濛始鑿的上古文明，即是他在本書中業已栩栩如生地爲我們所再造重鑄者。

託基爾德·傑可布遜
哈佛大學亞述學教授







1

兩河流域

一個作許願拜神之狀的人像，是在尼撲爾發掘出來的。上古兩河流域的拜神者在離開神廟時就留下這種小人像在廟中繼續向神祝禱。這個小人像是雲石與金做的，年代大約是在公元前2800年。

美索不達米亞，亦即古代希臘史學家筆下的“兩河流域”而大致相當於今之伊拉克的那塊地方，除却注入波斯灣的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所流經的那片蘆葦叢生的沼澤地帶而外，其餘大部份都僅屬一片荒涼的沖積平原；由於它的氣候大致炎熱乾燥，加以地無礦產，因此幾乎全無可供建築之用的石材木料；它的土壤倘不加意培養，可說純是磽瘠不毛的。

然而，世界上却無任何一地，能像今日這塊人所不喜的地方一般對人類的進步史具備如是深刻的意義——人類就在這塊土地上，憑藉着這一兩河搖籃的哺育而最初進入文明；世界最早的真正文明，就是在約莫五千年前，在這塊土地上，由一個名為蘇邁（又譯“撒馬利亞”）的民族，承續着遠溯洪荒的茫昧根株而創立發展的。兩河流域使人類首次建起了綽綽有餘的城市，展開了豐富繁複的多方面的生活：從此人類始有遍及於整個社會的政治効忠，而不復僅以某一部落或氏族自限；從此人類始有上沖霄漢的神廟高臺，使國民心中充滿了敬畏、驚奇及豪放自信；從此人類在藝術才技、製作分工與商業貿易各方面的創立發展上，才都獲得了用武之地。

而可能更重要的乃是：在兩河流域各大古昔城市之中，業已發展出了一套最初可供實用的文字，從而使思想傳達頓改舊觀，對於人類經濟、知識及文化的進展形成了無比深遠的影響。由蘇邁人創始並由其後兩河流域諸民族如巴比倫人、亞述人等所發揚光大的各色思想、技藝與發明，都分向東西兩方廣佈遠揚，在幾乎一切古代文化乃至我們今日的文化中，全部留下了痕跡。

兩河流域在人類文化史上的關鍵地位，直到最近方始為人所悉，不過許多大帝國之皆曾在該地創業開基，則已是大家早就知道的了。基督教聖經舊約中便充滿了關於那些帝國的話；前赴近東旅行的歐洲人早在12世紀時便已帶回來許多報

導，說是在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河間平原那些滿佈瓦礫的土墩下，就埋藏有已毀滅了的諸城市。然後到了19世紀，在一股狂烈的思古幽情風靡歐洲時，考古發掘者便開始去探究這些土墩，從而傳說中的巴比倫、杜爾·夏魯金、尼尼微以及其他遠古各大文化都市的璀璨文華，便在這些發掘中陸續展現了。

不過這些多屬英法人士的開風氣者，却亦常是一些未受專門訓練的發掘人，他們主要只在尋求珍奇的古物，對於某些看似無足輕重的細節往往漫不經心，而那些細節剛好是足助我們前去補綴古代面目的。因此，直到近東考古發掘再不復是獵取珍玩之行，而已成爲一項學術工作之後，兩河流域在人類歷史中的獨特意義始獲發現。這一轉折時刻的到來約在本世紀初，至是古董的搜求與漫無章則的狂探濫掘，始爲職業考古學家之高度精密的技術所取代。在1920年左右，建於完善科學基礎之上的近東考古學方才確立，從那時起，發掘工作者始視村莊一如城市，視茅屋一如宮庭，視壺甕鏟杖一如偉刻崇雕，對兩河流域這才開始作出了有系統的探掘。

考古學家在這些發掘工作中先後發現的千千萬萬刻有文字的黏土牌版，經過研究通讀之後，使學術界在對兩河流域歷史文化及當地人民生活情狀之重塑復顯上，獲得了無窮的啓示與幫助。這些用楔形文字寫下的載籍文獻，對於古代生活的幾乎每一方面都有所昭示——從鏗鏘典麗的帝王詔詔直到一名商賈的倉單，從文學宗教著作直到一位老父對其頑兒的訓誡，可說都無所不包，應有盡有。

1920年後二十年間，兩河流域考古學即在絡繹不絕的各項重大發現中標象着它的日趨成熟。在兩河流域南部的烏爾地方——聖經所說的查爾迪斯之烏爾——英國考古學家李奧納德·伍勒爵士掘開了公元前三千年的若干所謂皇陵而獲得了輝煌的收穫，諸陵中那些令人瞠目結舌的金、銀及青金石器物使舉世震驚於其財富之豐，而似屬活埋的殉葬諸人之遺骸則令人震駭不置。在該地西北約50哩處勘察聖經所云艾瑞克遺址的德國考古學家，則使年代遠溯及公元前3,000年的若干建在高臺之上的蘇邁神廟復行出土。學者們從這些殘址中獲得了數以千計的刻有象形文字的黏土牌版，其上的象形文字即是楔形文字的前身。更向北去，在古蘇邁一座大城基熙的遺址土墩下，一個英美合組團體更掘出了宏偉的建築、寺閣、墳墓，並從隣近一個較小的土墩內，找到了若干黏土牌版，因之獲得了更多有關文字發展程序的了解。

在兩河流域中部，即今日巴格達的東北，一個美國派出的團體則尋得了前此幾乎從無人知之各城市的神廟、宮殿與民居，同時還找到了約於公元前2700年製作的立體雕刻，成爲在兩河流域所得同類物品中之最古者。向西200餘哩，在剛出伊拉克的敘利亞境內，法國考古發掘者更着手發掘馬瑞，那是一個業在37世紀前毀於強敵的城市；一座佔地廣達七英畝的王宮，即是最見壯觀的殘址之一。

就在這些驚人的發掘陸續出現之際，其他發掘工作者又在更古老的遺址之上，層復一層地不斷向下挖，終於得以將兩河流域的遠古鴻濛逐步

推向了更古的時代。此外，在遠離兩河流域及其湮滅諸城的遙遠的彼方，在芝加哥大學的東方研究所內，學者們更對全世界各博物館所藏萬千黏土牌版上所刻楔形文字的每一字句，從事着一項大規模的分析乃至翻譯的合作研究。

這些豐收年代的繁富發現及其成績卓著的研究，再加上在這二十年後如許年間的更多業績，終於愈來愈清楚地證實了唯有兩河流域始配稱為“文明的搖籃”，任何其他地區都是絕對不足與之媲美的。

文明的締創在人類努力中乃是相當遲緩的事——大約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文明方始真正出現——在此之前的一段不知究竟長達多少世紀的漫漫歲月中，人類總算從穴居野處、單打獨鬥式的獵捕野獸與採食野生植物的生涯，漸進而為部落村莊式的馴養禽獸、種植糧食的生活，這便是文明的孕育時期；待到已可利用田園畜牧來維持比較穩定的生計並與隣居建起通力合作的關係之後，人類這才開始獲得閒暇去發展基本的才技、工藝、思想，並作更多更新的創造，由是方便人類漸進而為文明的存在。這項自游牧遷徙變為定居墾殖的大改革，大約出現於10,000年前；出現的地點則由專家推想為必在兩河流域，因為這塊業經公認為人類“始創城市生活”之地，自亦可視為即是“始創經濟革新”之地，農耕及家畜馴養，應該即是在這一區域之某處開始的。

最初試圖去追溯人類這一曖昧難明的重大轉捩點的先驅人物，是芝加哥大學的羅勃·J·布萊德伍德。他推斷人類應即是在兩河流域之幾無雨季的南方，在懂得了對該一滿布蘆葦的沼澤地

帶應該如何排水如何灌溉之後，方始建起最早諸城市的。不過最初的農村則必在北方，亦即今日名為庫爾迭斯坦之札格羅斯山脈側面坡地，因為該地雨量充沛，足使麥及大麥在野地自然孳生，而且綿羊、山羊、牛、馬、及豬的野生祖先在該地亦復所在多有——這塊幾尚未為考古學家觸及的地區，便正是布萊德伍德希冀可以發現世界最早農牧遺跡之處。

布萊德伍德這一“側坡”學說的證實機會獲之匪易，直至1948年方始到來——前此所有兩河流域的發掘，由各大學及各博物館董事會出錢而皆盼其能有動人收穫者，大致都密集在南方之吸引人的城墩或曰“泰爾”(阿拉伯文意指墩墟)一帶；這些遺跡內準可找到刻有文字的黏土牌版以及藝術珍品之類寶藏，而在北方土墩內者，則無非僅有並無文字的少許粗陋器物而已。

因此布萊德伍德必須自己創造機會。他終於以其不拔之志與如簧之舌，說動了芝加哥大學的主持人，告訴他們近東發掘的主要目的並非在為博物館求取展覽品，而是在求有助於闡明人類文化數千年來逐步演進的程序——此中特見重要的一大基本步驟，便是從搜集食物轉為生產食物，至於形成此一轉變的時期及地點，其解答極可能便是那些貌不驚人的庫爾迭斯坦土墩而非南方那些堂而皇之的城址。

布萊德伍德首次的主要發掘，是在北札格羅斯山下一塊名為加爾莫的三英畝土地上進行的，一共掘了好幾個月。他一開始便大有所獲；然後繼續下掘，直至迄未為人碰過的洪荒老土為止，他一共鑑定出了逐層相疊達15層的人類居址遺跡

——最下的10層尚在陶器時代之前，亦即其居民似尚處於不解燒陶俾供日用的原始狀態，但其文明亦已進展到能夠建造內分數室的長方形土屋，而且還附有爐竈、煙囪以及地下土爐的了；散布室內的器物說明了他們已是熟練的石匠，其中有經過打磨帶有鋒刃的石斧，還有足供說明他們已具若干編織知識的石紡輪，乃至磨工精緻的石灰石石杯、石碗等；此外，他們也有用獸骨製成的骨錐及骨針，並有用石、骨或黏土所製的項鍊、手鐲、指環及佩件之類首飾，而且他們還製出了未經火鍛的黏土人物塑像。

但更有意義的有關農耕史的重要發現則是：該一遺址內同時發現了已化炭質的若干穀品——兩種農作麥，另有小麥、小穗麥、農作大麥以及數種豌豆及青豆。他們的石製工具也包括了打穀的杵臼以及硬石鐮刀之類農具。此外，幾乎所有獸骨，都是屬於山羊、綿羊、牛、馬及犬這些個家畜或可馴之畜的。

簡略說來，布萊德伍德在加爾莫發掘所得，乃是當時所知之最古的一個定居性農業社羣——一個其年代約為公元前7000年的村莊，要與前此近東出土那些皆知製陶的最原始村莊相比，乃是一個僅其最晚期居民方知製陶的特別落後村莊；不過雖說落後，它的主要經濟却仍已到達農業上的比較進步階段了。

加爾莫對於遠古農耕情況之所昭示者，雖經證明為萬分重要，但它在農耕究竟始於何時何地這一基本問題上却仍然未能解決。由於這座村莊的生活，已是可能持續了400年之久的全面性的農業生活，因此布萊德伍德尚需另覓一個更古老

的居址，以求可以發現農耕始創時的那些遠更簡陋階段的殘跡。布萊德伍德乃對附近一個似更原始的地帶卡瑞穆·夏赫爾繼續從事發掘。

覆藏在卡瑞穆·夏赫爾地下的曾為人類所居的地層僅得一層，不似加爾莫的多層相疊。布萊德伍德便在這唯一居住層內掘得的遺留物中，找到了諸如石鋤、石磨、硬石鐮刀以及大量獸骨等等涉及農耕活動的線索——不過該處並無任何穀類或可供辨識的居室規劃的痕跡，而僅似一個淺耕粗植、一俟地力用盡便即顧而之他的半游牧民族的短期紮營地。因此，卡瑞穆·夏赫爾顯然即是更比加爾莫早上許多個世紀的農業方始萌芽的地區。

布萊德伍德這一經過仔細安排的發掘，至此總算已發現了兩個對最早農耕史都屬緊要萬分的地點了。作為暫駐式紮營地的卡瑞穆·夏赫爾所遺那些萌芽農耕活動的證據，使得以兩河流域為農業始源地的假想益見有力，亦使得布萊德伍德以北扎格羅斯山兩側為農業始源地的那一主張益發振振有辭。此外，加爾莫既屬迄今為止所知的最古的農村，然則人類經濟活動之轉為食物生產並從而形成定居生活的這一場所，大概也極可能便在兩河流域了。

這是直到1951年時都為眾所公認的學說。然後，考古學家在兩河流域隣近若干地區的某些發現，卻不僅使布萊德伍德這一農業肇基“山側”的假說岌岌可危，甚至連兩河流域大概即是經濟革命發源地的這一地位也都同受威脅了（雖然這尚不致影響其城市產生地的地位）——廣及巴勒斯坦、敘利亞、土耳其屬安納托利亞及伊朗等地

的多項發掘之所得，說明了農業的萌芽及因農作而興的最初社羣生活，極可能在這些地方都的確有過，而且都比兩河流域為早。

一項强有力的證明來自著名聖經城市傑瑞廓——靠近位於巴勒斯坦境內的死海北端，而由廣闊的敘利亞沙漠將之與兩河流域完全隔開的一個土墩，即是該城遺址所在。這個傑瑞廓不但不在山側，根本就深藏於海平面下幾達千呎的深谷之內，正是世界上一大至旱之區，僅因在它附近恰有泉流，泉水始使它四周之地成為綠洲而已。

考古學家在1952至1958年間將傑瑞廓這一土墩層層下剝，給於豁現出了一個方圓10英畝、外砌粗糙堅石為牆的可觀的陶器前城鎮，全城遺跡之中雖無任何穀麥獸畜跡象，但已有足徵農作之始的石磨與杵臼，且其規模估計乃是足夠供養大約2,000左右人口的了。

該城不僅面積龐大，更可驚異的乃是其年代之古遠。根據碳14的測驗（對於炭及骨骼之類有機物內輻射性碳之消失程度的測驗），該城年代大約早至公元前八千年甚或更早。是則在遠古老於公元前7,000年亦即兩河流域北部加爾莫開始鄉村生活之前許多世代，這一深處重幽的傑瑞廓，似乎便已完成了此項自搜集食物轉為生產食物而且開始定居的變化了。

不過無論兩河流域是否終須放棄其農業創生地及人類經濟革命始源地的地位，該地之究屬與農立基、終於創立文明且為人類城居之始的這一份，却仍是毫無疑問的——當農耕法自加爾莫周圍高原終於傳入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上游平原時，兩河鋪成的沖積沃壤即足使此後的農業

發展突飛猛晉了。

此一從寄生性的獵人改成生產性的農夫的變化，是如何發生又緣何而致的呢？在心理上，僅僅為了農家的三餐茶飯，便能使來往不羈的獵人居然肯放棄其自由放浪的傳統生涯，而自甘為土地室家所縛，此舉顯是相當奇特反常的。

此中原因應是：甘受定居生活之渺茫好處所誘的，大概並非游牧民族中那些自信自立、善能肆應的人，而是另一些願與這羣得心應手、盛氣凌人的夥伴乾脆分開，寧肯定居下來試用他種笨拙不妥的生產方式，去向土壤討生活的若干卑微軟弱的倒霉之輩。此外，婦女在勸使男子築室安居上當亦必有其貢獻——許多婦女當然都會感到安家落戶在養育子女上好處的確極多，她們之中特別能言善道且喜堅持己見者自必會力勸其夫定居下來，縱使短暫的逗留也都不錯。還有便是：昔時豐饒的野生蔬果之類，此際說不定已是日益稀少的了。

無論如何，農耕生活方式既經開始之後，本是弱者的即漸轉為強，本是因循懈怠的即漸轉為勤奮進取的生產者，於是本屬少數的人也就漸變而為多數了。從此，農耕技術遂在數千年中逐漸進步，終使部落、村莊、鄉鎮等遍佈古代世界，尤其是在兩河流域的北部。

9,000年前的加爾莫農民，與其後為人所知的特具發展文明之功的另一兩河流域民族之間，又相隔了好些個茫漠的世紀。但自五六千年以前開始，農耕這一星火所引生的悠長發展之諸階段便愈益明顯了，相當明確的諸文化至是即已開始

出現了——當然文字尚是遠在其後的事，這些文化都是僅由它們的獨特陶器及其他物質遺跡來作考斷的。

最早的一個文化，年代約在公元前5,800年，乃是本世紀四十年代為伊拉克古物署的考古學家首在今日摩蘇爾附近的哈蘇納土墩發現，因而即以哈蘇納為名者。哈蘇納原始居民，大概是已知原始農耕而亦兼事採集漁獵的半游牧民族，他們用來貯穀的粗陶器頗似加爾莫晚期居民所用，他們所住的臨時性的棚架今日業已毫無遺跡可尋；但是數代之後，該地人民大概有鑒於農耕生產更易見功，因而即已放棄游牧生活而定居於建築良好且已自成聚落的房屋之內了——這些房屋悉呈長方形，用日曬而非火燒的黏土泥磚築就，每屋皆內繞庭院，共有六至七室，其格局已極似今日伊拉克農民之所居；屋中尚有半藏土下用貯穀物的龐大黏土倉，若干家室且有燒烤麵包的圓頂爐竈了。

有了較佳居室之後，也就有了更好的陶器；這些陶器雖尚粗陋，但也開始有其光滑且具簡單紋飾之致了。待到哈蘇納後期，一種遠為優秀的彩陶，即與上述陋品同時出現——此種陶器，就其形色之美及其廣涉草木、鳥獸、人物的形相之豐而言，此後在古代兩河流域即未再有能復與之頡頏者；由於它們最初是在巴格達之北、曾為第九世紀阿巴西得回教國都城的撒馬拉殘址地下發現的，因此一般稱為“撒馬拉器”；它們可能出自跨越扎格羅斯山而來的移民巧匠之手，亦可能即是本地技藝美術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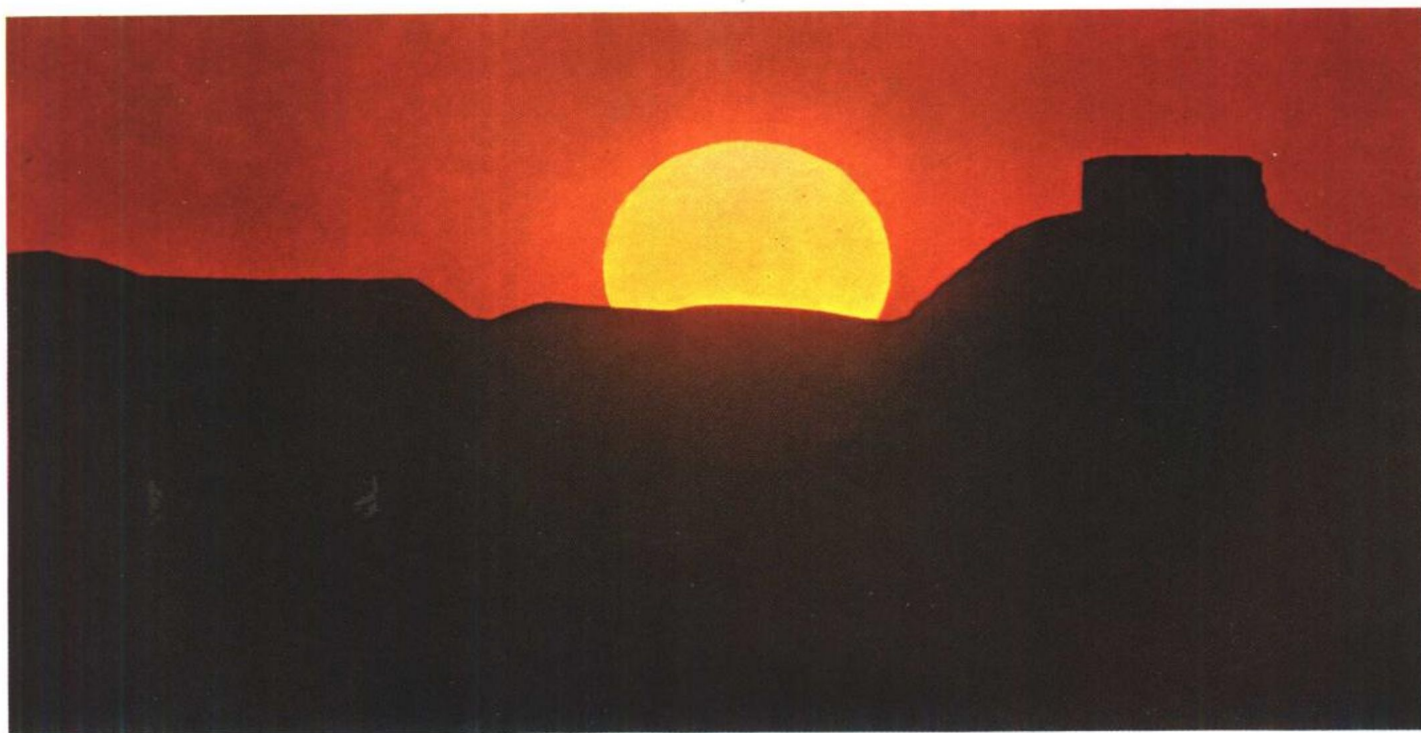
史前時期的遠地貿易即極可能因在此時已有

餘糧易貨而開始擴大，這是從哈蘇納居宅中散見諸器可資證明的。例如製作工具家具的黑曜石，即當來自今日土耳其東部的梵湖附近——那是黑曜石的最近產地；製造眼簾的銻及孔雀石與製造珠鍊飾佩的廉價玉石則來自伊朗，此外裝飾用的貝殼也應是從波斯灣一帶輸入的。

公元前5,000年左右，哈蘇納民族消失了，繼起稱雄於兩河流域北部達千年之久的另一新興文化出現了。這一新文化的最初痕跡是在敘利亞東北部之泰爾·哈拉夫發掘出土的，它的興起造成了迅速的進步——哈拉夫文化精力充沛，善於創新，在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展，在自扎格拉斯山北麓直達地中海的弧形地區內，散播出了廣大的影響。

農業生產在哈拉夫農夫的勤奮耕作下日益興盛。農夫們種植的穀物種類較前更多，村外牧場內也放牧着整羣的牛羊，若干村莊且有深堪自豪的小圓石道路之類公眾建設了。不僅如此，另一變動跡象亦正在醞釀之中，其影響之強烈遠大乃是幾與自游牧生活轉入定居務農可相媲美的——在哈拉夫遺址之石製工具中偶爾可見的銅器與銅珠串，已是近東石器時代告終、金屬時代曙光已展的憑證了。

不過造化弄人，經濟革命固然帶給了密佈北方的諸鄉村以前所未有的進步與繁榮，却也隨其影響所至，同時造成了許多新的沮喪委屈、冤抑難平的羣衆——這些自知貧無立錐，只好另打天下的憤懣的人，終於離羣去國，移徙到了兩河流域南部的沼澤地帶，而完全夢想不到他們日後的子孫們，竟能將該地一變而為文明搖籃的所在。



上圖是一個土墩在夕陽殘照下的輪廓。這土墩矗立在尼撲爾的蘇邁城遺址，它是在兩河流域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的一個主要場所。

從大地中掘出遠古

考古學家開始在兩河流域進行發掘之前，世人幾乎完全不知道4,000年前在該地域的確有過若干強盛的帝國。聖經及希臘與羅馬的史學家都曾簡單的提及巴比倫人及亞述人，但說得很含糊而且互相矛盾。至於那個更古的蘇邁民族，則根本沒聽說過，甚而不知道曾有這樣一個民族存在。

上古兩河流域諸民族之所以長久被人遺忘，主要原因是他們用的建築材料不好。埃及和其他古代諸帝國，多用足能耐久的石頭建築，兩河流域的人却用泥磚。長期的風雨、泛濫的河流和移動的浮沙慢慢地削平了這些磚，把所有的寺閣及宮殿都埋藏了，只剩下一些無定形的土墩。數千年來，無人想到這些土墩之中隱藏着秘密。可是到19世紀中葉，法國、德國和英國的考古學家們開始探索這些土墩了。不久他們就發現：上古兩河流域人乃是地球上人類最早在城市中生活者，最早研究星宿者，最早應用圓拱及輪轂者，最早著作史詩及製訂法律者。在今天，對上古文明的追求研究仍繼續在各遺跡進行，例如蘇邁的宗教之都尼撲爾（見上圖）。考古學家運用科學方法來分析研究建築殘遺、陶器殘片和黏土製牌版等等，正在使這個已知的世界最早文化能以更完整面貌重現。

Photographs by Georg Gerster